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苏门四学士

周义敢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苏门四学士

周义敢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55592



上海古籍出版社

955592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这套丛书是向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知识，内容包括文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流派，以及文学体裁方面的基本知识。丛书的编写力求观点正确，内容充实，叙述简明扼要，文字通俗易懂。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苏 门 四 学 士

周 义 敢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875 字数 65,000

1983 年 11 月第 1 版 198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01—34,900

统一书号：10186·433 定价(五)：0.29 元

引 言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诗、词、散文创作，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他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又是著名的画家。象他这样在文艺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的作家，在我国文艺史上并不多见。他还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后进，在《答李昭玘书》中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东坡前集》卷三十）经过苏轼的奖掖提携，他们在文学上各有成就，当时人称之为“苏门四学士”。这儿所说的“学士”，并不是指翰林学士或其它殿阁的学士，他们在生前也并没有得到这些官衔，而是指他们在宋哲宗元祐年间都在秘书省供职。宋沿唐故事，供馆职的皆通称为学士，而翰林学士则别称为内翰。

四学士先后出生于宋仁宗时，在英宗和神宗时均因举进士而得官。他们从政之初，就遇上了王安石变法。这次变法以理财和整军为主要内容，想抑制土地兼并，发展农业生产，限制官僚大地主的某些特权，练兵择将，加强边防，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但在当时，王安石的新法既受到以司马光、吕公著为代表的守旧派的反对，

也受到以苏轼、李常为代表的另一改革派的反对。受苏轼、李常影响的四学士，也毫无例外地卷入了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历来的一些评论文章，在肯定苏轼及其门人的文学艺术的杰出成就时，总要提到他们政治上的守旧或动摇，其根据是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无庸讳言，苏轼反对变法是错误的，但不能因此就在政治上否定苏轼。因为王安石变法毕竟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苏轼反对这样一种变法，也有其合理之处。苏轼一生不仅主张文艺革新，而且在政治上也主张革新。他强调吏治改革，认为法虽善，而“吏不肖，只能扰民”。他主张“裕民丰财”，指出当时的赋税已经苛重，不应再“广求利之门”，应修改专卖办法，让工商贸易自由发展。他呼吁切实整顿军备，抗击辽和西夏的侵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为宋王朝的丰财、强兵，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工作。在这根本出发点上，他同王安石实际上没有分歧。他们的分歧只是改革的主张不同而已。过去的一些文章以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作为评价当时人物功过的标准，显然是不完全合适的。至于四学士对新法的态度也不完全一致。其中秦观与苏轼的政见大致相同，但他从政的时间不长。黄庭坚对盐法、市易法和农田水利法曾有异议，而对王安石则表示相当的尊敬。张耒认为某些新法扰民，但并不公

开反对，只是在议论中援古证今、旁敲侧击而已。晁补之的诗文则很少涉及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至于如何对待辽和西夏，他们与苏轼一样，都反对“重赂求和”，写有不少策论，提出克敌制胜的良策，与王安石的整军措施并不矛盾。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十岁的哲宗即位，由神宗的母亲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守旧派司马光、吕公著主持朝政，开始了“尽废熙丰新法”、打击变法派的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元祐更化”。当时苏轼坚持对新法“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只赞成废除有弊无利的新法，而对免役法只主张去其弊而不变其法。李常也持同样的态度。由于“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苏轼曾两次被迫离京去作地方官。四学士此时先后俱供职秘书省和国史实录院，在政治上与苏轼大致同一步调。

哲宗亲政后，变法派章惇、曾布执政，也用同样的手段沉重地打击反变法派，剥夺他们的官职，把他们流放到僻远地区加以“编管”。苏轼、黄庭坚、秦观最后被贬到岭南或海南，张耒与晁补之受惩稍轻，也长期赋闲。徽宗即位后改元崇宁，意思是崇尚熙宁变法。但此时的新法实际上已经变质，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已成为党派私利的斗争。徽宗还下令立“元祐奸党”碑，并御书刻石于端礼门外，其中也包括苏轼和四学士。崇宁二年，蔡京又自书“奸党”为大碑，立于外路军州，徽宗还诏毁二苏和四学士等人的文

集。以后对元祐党人的摧残虽有所缓和，但终徽宗一朝，苏轼和四学士等人都未能恢复名誉。在北宋临近灭亡时，他们均先后含冤死去。

苏轼与四学士在政治上是同命运，共进退，而在文学上则诗文酬唱，丽泽切磋，并无文学派别的涵义。最能说明这种关系的是苏轼的《答张文潜书》：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①与君等数人耳。（《东坡前集》卷三十）

一般的师友承传，常常是门户森严，恪守家法。但苏轼却视“使人同己”是文学之患，鼓励门下士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这是有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他指出王安石才高学富，文未必不善，但欲以其学同天下，结果使文学空前衰落，弥望皆黄茅白苇。在他看来，文学应丰富多彩，应允许多种艺术风格同存共荣，就象沃野千里，万物生长，百花争艳，美不胜收。他还希望“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广泛地、全面地学习前人的长处，开扩视

①陈履常名师道，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彭城人，著有《后山集》。他和李廌(zhì 稚)也出于苏轼门下，加上四学士，人称“苏门六君子”。李廌，字方叔，华州人，著有《济南集》等。

野，提高文艺素养。在他的启示和扶植下，门下士们的文学风格各不相同，正如张耒《赠李德载》一诗中所描写的那样：

长翁波涛万顷陂，少翁崢嶸千寻麓①。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②。秦文蒨藻舒桃李，晁论崢嶸走金玉③。六公文字满人间，君欲高飞附鸿鹄。

关于苏轼与门下士如何诗文相契、相与润色，在他们的文集中和宋诗话中有不少记载。试举二例：

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王直方诗话》

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道之。

——《山谷诗内集》卷五

前一例反映了他们师友之间常常相互评论各自的创作，而且是平等地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后一例是黄诗诗题。黄庭坚说，苏轼象韩愈那样，有时写诗还效“受业弟子”，他怕后生不理解，于是就用苏诗的原韵写和诗，加以说明。诗中提到：“我诗如曹邴（kuài

①长翁指苏轼，少翁指苏辙。这两句是说苏轼的诗文奔放豪迈，气势雄浑；苏辙的诗文清秀奇拔，气骨尤高。陂(bēi 悲)：池塘。《世说新语·德行》：“叔度汪汪如千顷之陂。” ②黄郎指黄庭坚，陈子指陈师道。这两句是说黄诗好奇尚硬，去陈反俗；陈诗潇洒超脱，风格简古。 ③秦，指秦观；晁，指晁无咎。这两句是说秦的诗文绚丽多彩，如桃李；晁的诗文不平凡，字字如珠玉。蒨(qiàn 倩)：鲜艳的样子。

快)，浅陋不成邦^①，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他们诗文往复，常用一种诙谐的方式来表示相互的情谊，表示他们虚怀若谷，能取长补短。

下面按四学士出生年月的先后，分别加以介绍。

^①曹、郢：都是西周时的诸侯小国。庭坚用作比喻，说自己的诗浅陋不成邦，无法与雄浑壮阔的苏诗相比。

目 次

引言	1
一、黄庭坚	1
(一) 家学渊源与九死蛮荒	1
(二) 奇拗硬涩的诗歌	8
(三) 江西诗派的领袖	27
(四) 品类多样的词	34
二、秦观	38
(一) 穷愁潦倒的一生	38
(二) 议论锋起的策论和文论	44
(三) 凄清妍丽的词	49
(四) 清新妩丽的诗歌	59
三、晁补之	64
(一) 少负才名与宦海升沉	64
(二) 豪放沉郁的词	70
(三) 温润典缛的诗文	75
(四) 为文缘饰而行事业	81
四、张耒	84
(一) 弱冠及第与贫病而卒	84
(二) 朴素自然的诗歌	90
(三) 艳丽浑成的词风	100
(四) 议论、史论、文论	102
结束语	109

一、黄庭坚

(一) 家学渊源与九死蛮荒

黄庭坚，字鲁直，因曾游灊(qiān 潜)皖^①山谷寺石牛洞，喜爱该地的林木泉石，自号山谷道人；又因曾贬官涪州(今四川涪陵县)，号涪翁。宋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生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死于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一共活了六十一岁。

山谷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父亲黄庶，字亚夫，庆历三年进士，一生都作州郡的属官，后曾代理康州知州。黄庶论诗推重李、杜、韩，反对浮华纂组的西昆体，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著有诗文集《伐檀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他“诗近体不甚工，古体则力拟昌黎，戛戛独造，实开江西宗派之先。”可见山谷写诗辟奇创新，实渊源于家学。他的叔父黄廉，字夷仲，仁宗嘉祐六年进士，熙宁初王安石荐为司农丞，曾任监察御史里行、提点河东刑狱等职，赞成新法，深得神宗赏识。元祐初司马光因其干练多才，荐为户部郎

^①灊皖：汉代为皖县，宋代为舒州，今安徽潜山县。

中。后因曾附新党，改陕西都转运使，拜给事中。

“少也长母家，学海颇寻沿。诸公许似舅，贱子岂能贤。”（《奉和公择舅氏送吕道人研长韵》）山谷此诗自叙少年时丧父，十五六岁时跟随舅父李常（字公择）游学淮南，学业大有长进，言行深受舅父的影响。李常是著名的藏书家。苏轼的《李君山房藏书记》就是记他藏书和读书的情况。山谷自幼博览群书，就是因为有这一良好的学习条件。李常在熙宁初知谏院，因论青苗法、均输法不利于民，被贬到滑州、齐州等地。元祐初他任户部尚书，主张去免役法之弊而存其法，与司马光意见相左。后任御史中丞兼侍读。

山谷的第一个岳父孙觉（字莘老），是当时著名的诗人，与李常是知交。山谷的《和答莘老见赠》一诗曾提到他们的初次相见：“往岁在辛丑，从师海濒州。外家有行役，拜公古邗（hān寒）沟^①。”辛丑年他十七岁，随舅父在扬州拜见孙觉。孙觉很赏识这位年轻人，并把女儿嫁给了他。范温的《潜溪诗眼》记载山谷跟随孙觉学诗的情况：

山谷常言少时曾诵薛能诗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孙莘老问云：“此何人诗？”对曰：“老杜。”莘老云：“杜诗不如此。”后山谷语传师云：“庭坚因莘老之言，遂晓老杜诗高雅大体。”

王直方也曾经说起：

①邗沟：原指扬州一带的运河，这儿是指扬州。

元丰初，山谷过下邳淮阴庙，作以示孙莘老。言其太过，无含蓄。山谷然之，遂改今诗。（《山谷诗外集补》卷二《淮阴侯》诗后附注）

上述记载说明，孙觉指导山谷写诗，既注意风格体性，又注意创作方法，是比较全面的。孙觉在熙宁初知谏院，因论青苗法、常平法被贬到广德、湖州等地。元祐年间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兼侍讲。孙觉的政见和宦海升沉，与李常大致相似，对山谷的思想影响，同样是很大的。

山谷的第二个岳父谢景初（字师厚），也是当时学杜诗有成就的诗人。山谷很崇拜师厚，曾对王直方说：

师厚方为其女择对，见庭坚诗，乃云吾得婿如是足矣。庭坚因往求之。然庭坚之诗竟从谢公得句法。故尝有诗曰：“自往见谢公，论诗得濂梁。”（《王直方诗话》）

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山谷二十三岁时考中了进士，次年任叶县（今属河南）尉，先后共三年。他为官正直，关心民生疾苦，但对推行改进农业生产的新政策很不得力，比较保守。当时新法要求该地改种麦子为水稻，山谷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名为利民，其实害之”。而王安石似乎对他并无恶感，相反还曾称赞他。《垂虹诗话》云：

山谷尉叶县日，作《新寨》诗，有“俗学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觉折腰难”之句，传至都下，半山老人见之击节称叹，谓黄某清才，非奔走俗吏，遂除北都教授。

《垂虹诗话》不知撰者姓名,《新寨》诗也不见于《山谷诗集》,所记也可能得之传说,但至少可以说明,宋人认为王安石对山谷是友好的。

神宗熙宁五年,山谷考中学官,任北京(今河北大名县)国子监教授。当时的北京留守、太师文彦博很器重他,留再任,一直留到元丰二年。他在北京前后共八年。其间对他最重要的是,在元丰元年他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两首诗,给当时的徐州知州苏轼。苏轼也和了韵,在复信中赞扬他“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古风二首,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从此,这两位大文学家相互推许,终身相重,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佳话。苏轼当时特别延誉山谷,固然由于山谷的诗文“妙绝当世”,也由于他自己与李常、孙觉交谊深厚,政治主张也大致相同。在北京期间,山谷与晁无咎结识,他的《定交诗效鲍明远体呈无咎》一诗云:“执持荆山璧,要我雕琢之”,可见他曾为无咎修改过诗作。

元丰三年,山谷改官知吉州太和县(今江西泰和县)。路过高邮时,他与秦观第一次见面,相得甚欢。太和当时号称难治,山谷到任后为政宽厚,民心逐步安定。当时正实行新的盐茶专卖法,各县争售多数,邀功行赏。而山谷则“不篡非己事,不趋非吾时”,深入乡间调查,从不生事扰民。元丰七年,他到德州德平镇(今山东德县)任监税。当时的德州通判赵挺之想在德平镇推行市易法,而山谷认为“镇小民贫,不

堪诛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从此他们两人水火不相容，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政见不同。

元祐初年，李常、孙觉和苏轼兄弟都成为朝廷显要。山谷被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又因司马光推荐，与范祖禹同校定《资治通鉴》。以后又任神宗实录院检讨官，著作佐郎，集贤校理。他在馆阁前后共六年，后因丧母，回分宁老家守孝。

早在元丰末年，张耒曾致书山谷，表示一向倾慕和愿意结交之心。入京后他们终于欢聚，双方都很激动，这有诗为证：

千里不相见，劳劳复何辞。不远一城中，耿耿令我思。……

——张耒《初到都下供职寄黄九》

短褐(hè 喝)不磷缁(zī 资)①，文章近楚辞。未识想风采，别去令人思。……

——黄庭坚《次韵答张文潜惠寄》

不仅他们两人诗酒流连，相互推赏，而且晁无咎和秦观也先后到秘书省、国史实录院供职。四学士与苏轼、李常等前辈，在暇日或举酒欢宴，或同游京都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这是他们难以忘怀的欢乐年代，也是北宋文坛的盛事。据称：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

①短褐：兽毛或粗麻制成的短衣。磷缁：言受磨而薄，受染而黑，受外界影响而被同化。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章惇、蔡卞弹劾山谷、秦观等人修《神宗实录》失实，“类多附会奸言，诋斥熙宁以来政事。”结果山谷被贬为涪州别驾，先后被安置在黔州（今四川彭水县）戎州（今四川宜宾县），在这些当时的荒僻地区度过了艰苦的六年。他虽历经忧患，但毫不介意。蜀中文士慕名来就学，他从不拒绝，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徽宗即位后，山谷似乎要被起用，先后被任命为舒州知州、吏部员外郎等职，但均未到任。当时蔡京、赵挺之执政，山谷任太平州知州仅九天就被免职。在以后两年多时间中，他流寓在荆州、鄂州一带，曾经写了著名的诗篇：《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通过诗，他为苏轼、苏辙鸣不平：“岂谓高才难驾御，空归万里白头翁？”^①他怀念“形模弥勒一布袋”^②的张耒，也哀悼才思敏捷但已离开了人间的秦观。在荆州，山谷还写了《承天院塔记》。仇家陈举根据赵挺之的意向，从文中摘出数语，锻炼出“幸灾谤国”的罪名。于是山谷被除名，流放到宜州（今广西宜山）。作为受羁管的罪官，他不准居住寺院或租用民房，也不准住在城里，只能栖身戍楼^③，“上雨旁风，市声喧聒”，其困苦可想而知。崇宁四年，他死于戍楼。

山谷所受的教育和一生所恪守的，自然是中国

①这两句诗意说“难道怕他们才高难于驾御，就让这两位老人从万里外白白回来吗？”

②这句戏称张耒胖得象弥勒佛。

③戍楼：原是指边城上的望楼，这儿是指城楼。

传统的儒家学说。他在《送王郎》一诗中写道：“炒沙作糜终不饱，镂冰文章费工巧^①。要须心地收汗马，孔孟行世日杲杲(gǎo 搞)^②。”他在《与洪甥驹父书》中也说：“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极当加意，养以敦厚纯粹，使根深蒂固，然后枝叶茂耳。”（《山谷老人刀笔》卷一）他把孔孟之道行于世比作如日月经天，把封建纲常作为人们道德修养的根本，在加强儒学统治的宋代是很自然的事。这一道德观念使他虽然屡遭贬斥，但都能坚持节操，置生死于度外；使他在作地方官时能省刑薄敛，实施仁政。反映到诗文创作中，使他认为文是表现道的一种工具，因而不少作品充满陈腐的说教。但儒家的仁政观念，也使他写出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好作品。

山谷以儒家之徒自居，又力图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圆通道、佛两家，构成其独特的思想。他是禅师祖心的入室弟子，一生虔诚信佛。由于身罹党祸，特别是在晚年遭受致命打击，佛老思想也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他把儒学的“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和佛老的“清静去欲”、“退听返闻”结合起来，作为他对付恶劣环境的思想武器。这给他的思想带来消极遁世的色彩，使他借以逃避现实，调和党争；也使他能安贫

①糜：粥。这两句说，炒沙作粥不能充饥，在冰上刻花纹是枉费工夫。 ②杲杲：形容太阳的明亮。这两句是说人应该收敛自己的放纵之心，以孔孟之道光明行世。